

## 汪蒋权力之争视阈下谷正纲职位升迁探析

陶仁义 杨荣庆

〔摘要〕 谷正纲,汪蒋权力之争的参与者、受益者。国民政府初期,谷正纲离蒋拥汪,得以声名鹊起;九一八事变后的蒋汪再次合作,谷正纲为汪精卫日渐倚重,职位得以不断升迁,官至组织部副部长;汪精卫叛国后,谷正纲迅速与其划清界限,效忠蒋介石,任社会部部长近十年,为民国政坛所仅有。拥汪随蒋皆能持续升迁,除谷正纲个人政治智慧不断提升外,亦与当时汪蒋二人性格及国内外环境交织下汪蒋权力斗争复杂态势的变化有关,其经历堪称国民政府官员政治生态的缩影。

〔关键词〕 谷正纲 职位升迁 汪蒋权力之争

谷正纲(1901—1993)<sup>①</sup>,贵州安顺人,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部长一职近十年之久,为民国部级官员当中所仅有<sup>②</sup>。但是谷正纲好友兼同事陈克文在其日记中却把谷贬为“革命暴徒”“党痞子”,甚至认为改组派成员“几无一满意于谷者,惟汪先生似甚倚之”。对于这一矛盾现象,陈亦“难明其所以”。<sup>③</sup>谷正纲从汪派骨干变为蒋系要员,学界对此并无深入探讨,谷正纲的派系转变与其职位升迁密切相关。对此深入探讨可为民国官员政治生态研究提供极佳个案,亦能对蒋汪权力之争提供一个由下往上的新视角。

### 一、离蒋拥汪 政坛新秀

1926年,国共合作出现危机,远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谷正纲、谷正鼎兄弟等一众国民党学员深受影响,他们积极活动,组成“孙文主义学会中山大学分会”批判共产党,引起了部分接近中共的国民党学员反感,在以谷氏兄弟为骨干的活动被揭发后,他们随即被遣送回国。<sup>④</sup>1927年5月,谷正纲成为蒋介石筹办中央党务学校筹备委员,负责相关事宜,该校开学后任训育处副主任一职,因训育处主任丁惟汾无法到校主持工作,谷正纲负责训育处实际工作。谷擅长演讲,鼓动感染力强,在学员中颇有影响。

11月22日,南京各界民众团体举行“庆祝讨

唐胜利”大会,宣布打倒西山会议派、取消特别委员会等议案。在蒋介石授意下,陈果夫暗中鼓动大会情绪,让谷正纲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会后,在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带领下举行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时,军警开枪,当场打死学生2人,打伤75人。案发后,陈果夫及其党羽即在各地指控西山会议派为制造一一二二血案的主谋,陷西山会议派于狼狈不堪的境地。于是,蒋介石便借此发起对西山会议派的声讨,迫使在特别委员会中握有实权的西山会议派逃离南京,从

① 1921年8月携弟谷正鼎考入柏林工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次年2月转入柏林大学哲学系。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毕业后,经国民政府选派,谷氏兄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5月被苏联遣返回国,筹备中央党务学校,并担任训导副主任。一一二二事件中为蒋介石的复出立下功劳。1929年三一二事件后加入改组派成为汪派干将,职位不断升迁。1934年11月出任实业部常务次长,1935年12月被任命为组织部副部长,1938年1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负责社会工作,尤其是战时社会救济与福利补助事宜。汪精卫叛国后投效蒋介石,1939年出任中央社会部长,直至1949年3月辞职未被批的情况下离职。

② 张朋园、沈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242—247页。遍检民国时期其他部门的部长履历,连任时间以谷正纲为最久。

③ 陈克文《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223、228、229页。

④ “中华民国留俄同学会”编《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踣厉》,台北:中华图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而为其重新上台扫除障碍。<sup>①</sup>此次事件使蒋介石从幕后走向台前,成功促成蒋于1928年1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并在2月、3月分别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借助谷正纲立下的汗马功劳,蒋介石顺利将军政大权又重新集于一身。事后不久,蒋介石即携新婚妻子宋美龄,在陈果夫、谷正纲等人陪同下到中央党务学校视察,并对全体学生大加褒奖。一一二二事件中,谷正纲虽为蒋介石的复出冲锋陷阵,资历尚浅的他事后并未能够立刻进入蒋介石的核心权力圈,继续在中央党务学校担任训育处副主任。

“以党治国”是孙中山生前所设定的由“军政”向“宪政”迈进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训政”时期的治国方针。1928年2月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汪精卫为首的党派分子,在与蒋介石争夺国民政府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失败。汪发起改组国民党运动,声称要“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以维护“党权”,恢复“党治”,以此显示党权高于军权,重夺权力。<sup>②</sup>蒋介石以武力统一全国后,不甘就此将权力交由汪精卫为首的党统派系,依靠“黄埔系”为班底的军事力量,与汪精卫之间爆发了一系列从选举到军事的权力争夺,在此期间谷正纲加入了改组派阵营。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告“军政”结束,“训政”开始,并制定了《训政时期约法》,实行“一党训政”“一党领政”,实务上施行党国体制。事实上,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过的《训政纲领》虽将党权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实际运作方面,北伐后形成的地方军权割据分治局面依然如故,国民党中央党权则为蒋介石军权所控制。在地方上,蒋介石提出了《拟请规定党部与政府及政府与民众之关系及其职权案》,要求党员与行政人员分开,党员仅作指导民众、监督行政人员之责,但不允许直接干政,削弱“党治”。改组派遭到严重打压,“三大”前后,一些地方党部和大批“左派”国民党青年聚集在改组派的旗帜下公然向中央权威挑战。国民党“三大”代表之所以多由南京中

央指派而非地方党部选举产生,即因蒋介石担心无法控制地方党部的行为而采取的应变措施。<sup>③</sup>10月,蒋介石“指派”“圈定”的国民党“三大”代表名单公布,其中“由党员直接选举者,仅占全数25%”,而“圈定与指派之总额,占全数75%”。<sup>④</sup>名单一公布立刻引发了改组派的不满和反对,陈公博利用国民党内的不满情绪,要求“实行党的民主化、民众化”<sup>⑤</sup>,掀起反蒋政治运动,以达到获取党内权力的目的。在抵制蒋介石包办的三全大会的运动中,南京特别市党部的抗议活动因谷正纲而最为激烈。

为蒋介石复出立下大功的谷正纲与时任南京卫戍司令<sup>⑥</sup>的大哥谷正伦均在指派圈定的代表名单之列,但对三民主义充满理想主义情结的谷正纲同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日益感到失望和不满,“分共本来是他们的希望,但分共之后而致开倒车,则为他们所恐怖”。<sup>⑦</sup>改组派的文人政客捕捉到了青年们的思想脉动,利用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遂打出“党统”的招牌,高喊提高“党权”,提出了适合他们愿望的改良主义主张,“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sup>⑧</sup>“改组国民党”的口号一经提出,青年们便纷纷汇聚到这面旗帜之下,谷正纲和谷正鼎兄弟也是众多青年中之一。<sup>⑨</sup>11月18日,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三十多人前往中央党部递交

① 张宪文、方庆秋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③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④ 《中国国民党南京市第一次全市代表大会告全党同志书》,《民意周刊》1929年第2—4期合刊,第43页。

⑤ 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1928年第1期。

⑥ 《党部国府联席会议》,《申报》,1928年5月13日,第4版。根据资料,谷正伦已经被任命为首都卫戍司令,三一四事件时,谷正伦仍然在此职位上。

⑦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22页。

⑧ 存统《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革命评论》1928年第5期,第10页。

⑨ 罗方中《关于改组派的一鳞半爪》,《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5—66页。

抗议书,抗议中央剥夺党员的权利。谷正纲和中央大学学生吴健等改组派学生被推举为代表,列席中央常会,要求对抗议书进行立即答复,结果被胡汉民在会上痛骂了一顿。谷正纲、吴健等人不甘屈服,退出会议后开始酝酿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sup>①</sup>

1929年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等13人在上海发表宣言说,国民党已为“腐化分子和投机分子”把持,“依照该代表选举法与代表产生法,将近百分之八十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本党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sup>②</sup>3月14日,“三大”开幕前夕,改组派控制的南京市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在夫子庙贡院大礼堂召开,谷正纲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在会议开幕词中提出了“反独裁、反圈定代表”的口号,紧接着改组派代表提出了《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案》。<sup>③</sup>下午,大会对这一提案的讨论遭到会场中蒋派分子破坏,在谷正纲主持下,得以继续对提案进行讨论,并最终获得通过。蒋派分子恼羞成怒,大肆破坏会场,对会场中的改组派分子进行拳打脚踢,改组派也予以抵抗还击。会场变成了战场,双方大打出手。多名改组派分子被打伤,谷正纲更是“身受重伤,不省人事”,如果不是现场暴徒中有人认出了他是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的弟弟,谷正纲的性命也难保。<sup>④</sup>

当晚,谷正纲被蒋介石免去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副主任职务,即前往上海,正式加入改组派。蒋介石于次日早上6时召集中央党务学校全体学生训话,“三全大会系中央及本校长之意志为意志,竭力拥护,并须绝对服从本校长命令,不得有丝毫怀疑,或反对之表示。现任训育处副主任谷正纲,言行乖谬,已免本职。”“闻谷正纲十四晚接到免职令后,即于十五晨离京他适。”<sup>⑤</sup>

随即,谷正纲发表《谷正纲为不出席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敬告南京全市同志书》,痛斥“这次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不是代表民力的力量和意志,是代表反民力的力量和意志——即实力派,官僚政客,昏庸老朽以及封建式的小组织的力量和意志。”主张“欢迎革命领袖汪精卫

同志等来京主持中央,反对昏庸老朽及一切反革命分子”。<sup>⑥</sup>

三·一四事件是蒋介石对改组派日益激烈夺权活动的一个正面回应,紧接着又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镇压措施。一面组织文人对改组派进行理论上的批驳,说改组派所持的中心理论,“是农工与小资产阶级同盟革命,说来说去,还是共产党的蓝本,不过是稍变易其表面渲染的方法而已”。<sup>⑦</sup>一面对改组派的组织进行破坏,查封改组派的“干部训练所”——大陆大学,查禁各种期刊杂志,处分其骨干成员。10月3日,国民党第39次中常会以“勾结军阀余孽”“颠覆党国”等罪名决议通缉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余、陈树人、潘云超、郭春涛等10人。11月28日,国民党第52次中常会又通过决议,将上述除陈公博以外9人开除党籍(陈已于3月20日被永远开除出党)。12月19日,中常会第58次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给汪罗列的罪名是“勾结陈公博、顾孟余等设立小组织,欺骗无知青年”,“主持逆谋”联合军阀,“颠覆党国”等。<sup>⑧</sup>由于谷正伦是蒋介石心腹,在其庇护下,带头闹事的谷正纲并没有像改组派的其他成员那样被开除出党,或遭到通缉、羁押。

三·一四事件使汪精卫及其追随者认识到,通过法定选举的方式无法重回最高权力之位,他们转而寻求通过军事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① 杨者圣《国民党教父陈果夫》,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② 汪精卫等《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民意周刊》1929年第2—4期合刊,第1页。

③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④ 罗方中《关于改组派的一鳞半爪》,《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66页。

⑤ 《蒋主席在党校训话》,《申报》,1929年3月16日,第9版。

⑥ 谷正纲《谷正纲为不出席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敬告南京全市同志书》,《民意周刊》1929年第5—6期合刊,第35页。

⑦ 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改组派的真面目》,1929年11月,第55—56页。

⑧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0—571页。

改组派利用此时蒋介石打击阎锡山势力的机会,联合受蒋打压的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将夺权计划付诸军事行动。1930年5月11日,中原大战爆发。大战前期,为配合军事斗争的需要,改组派的期刊杂志纷纷复刊,对蒋介石进行口诛笔伐。

5月25日,改组派喉舌刊物《革命战线》短暂复刊,在刊出7、8、9三期后便又被蒋介石查禁。复刊旨在“阐扬本党理论,评述国内政治、介绍国际情形、指导革命进行”。<sup>①</sup>其实质仍是对南京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个人予以批判、攻讦。谷正纲发文响应,直斥“南京政府的军阀官僚,即从北京政府而继起”。“及至去年蒋中正篡窃本党而后,则党的革命主义,已被唾弃;党的革命纲领,已经破毁;党的革命势力,早已破碎;党的革命精神,早已丧失。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已成为军阀官僚的工具,腐化分子的集团。”<sup>②</sup>

反蒋联军一度取得了军事优势,眼见推翻蒋介石政权在望,为了重新执政,汪精卫拉拢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发表东电“北平协议党务,久而未决,愚以为今日最要在于团结,而团结之道在于继续十三年春间总理改组本党之精神,及第一届代表大会宣党政纲。”<sup>③</sup>东电得到了改组派各级组织的广泛响应。谷正纲亦步亦趋,立刻刊文响应汪精卫的号召,同时继续对蒋介石予以批判:“因本党自被蒋中正篡窃以来,党的民主精神,则已毁灭殆尽;人民的革命权利,则已剥削无遗。”故此次讨蒋“于党则须恢复民主集权”,“于国则须实现民主政治”。<sup>④</sup>紧接着,汪精卫又撰文重申“如果牺牲二中,以迁就西山派,是不合理的。至于团结同志的动机,与西山派消释前嫌,以期一致努力,则我认为合理。”<sup>⑤</sup>意在以改组派为中心,联合西山派,壮大反蒋声势,为自己重掌权力铺路。

中原大战进行到11月,张学良出兵支持蒋介石而以蒋胜出。改组派军事反蒋宣告失败。1931年1月1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宣言,解散改组同志会,改组派成为历史。谷正纲继续追随汪精卫,成为汪派的核心成员。

## 二、汪蒋合作 职位提升

三全大会的抗争和中原大战的接连失利,意味着汪精卫争“党权”的失败,“党治”渐行渐远。自30年代以后,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逐渐沦为替蒋介石独裁提供合法性的橡皮图章。<sup>⑥</sup>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形势,再次与汪精卫进行合作,汪精卫对重夺最高权力看到了新希望,试图通过引导舆论,谋求国际和平的方式为自己增加新的政治资本,继续与蒋进行最高权力的争夺。蒋介石为表合作诚意和拉拢人心,在一些虚职部门上,任命了之前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部分汪派骨干人员。1931年年底,汪派骨干分子顾孟余、陈公博分别任铁道部、实业部部长。谷正纲也开始进入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职位不断升迁,先当选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sup>⑦</sup>,后被推选为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sup>⑧</sup>。1934年11月6日,实业部次长郭春涛辞职出国考察,谷正纲被任命为实业部常务次长。<sup>⑨</sup>次年年底,谷正纲被任命为组织部副部长。<sup>⑩</sup>1935年11月12日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谷正纲与其兄谷正伦、其弟谷正鼎同时当选中央委员,被时人誉为“一门三中委”。

民族危机之下的蒋汪二人维持着表面上的合作。谷正纲公开场合下直言直行的作风也不适合国内一致对外的需要,对蒋介石的攻讦亦不如之前那般凌厉,但在维护汪派利益时仍毫不让

① 《革命战线复刊启事》,《革命战线》1930年第7期。

② 谷正纲《现在我们应有的认识》,《革命战线》1930年第8期,第23页。

③ 《汪精卫先生东电》,《革命战线》1930年第9期,第1页。

④ 谷正纲《汪先生东电的意义与我们应有的努力》,《革命战线》1930年第9期,第5—8页。

⑤ 汪精卫《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之必要》,《革命战线》1930年第9期,第2页。

⑥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65页。

⑦ 《本埠新闻二》,《申报》,1931年12月4日,第11版。

⑧ 《中央常务会议》,《申报》,1932年3月9日,第2版。

⑨ 《通过实业部两次长人选》,《申报》,1934年11月7日,第3版。

⑩ 《一中全会五次大会 推行中枢负责人员后闭幕》,《申报》,1935年12月8日,第3版。

步,这在谷担任实业部常务次长期间,对申新七厂事件的处理上显得较为突出。

1935年,谷正纲就职实业部常务次长不久,就遇到轰动一时的“申新七厂事件”<sup>①</sup>。在国内民族主义浪潮的舆论下,围绕着要不要救济申新七厂,表面是财政部和实业部两部采用自由市场方式还是国家统制方式之间的难以取舍,实际上是以财政部长孔祥熙为代表的蒋派势力和以实业部长陈公博为代表的汪派势力之间的政治角力。当时行政院发函令全国经济委员会查照办理,随即由其下属的棉业统制委员会派员与财政部、实业部派员会同清查估计,并由申新公司主管人员同时在场,共同拟具根本救济方案。陈公博遂提出整理申新、改为国营的办法。陈一贯认为,中国的工业“尚在幼稚时期,工业团体的组织,更是涣散而无力”,他不主张采用自由经济,“除了采取统制政策外,别无良法”。<sup>②</sup>而荣宗敬为了自己掌控把握申新工厂,利用自身的人脉并联合国民党要人吴稚晖,反对陈公博提出的对申七进行国家统制整理的建议,陈公博的统制计划被搁置。

谷正纲继续进言,在为陈公博的统制政策辩解的同时,斥责财政部的不作为。谷在实业部的机关刊物发文表示“这次上海申新第七纱厂被汇丰银行拍卖的事件,其事体虽仅系二百万元的商业借款问题,但其事态于法律、外交、经济各方面,都具有很严重的意义。”在对由申七事件引发出来的中国纱业危机的外在、内在因素分析后,谷正纲认为此次事件得以持续并不断扩大,过不在己,“去年申新纱厂风潮发生,政府曾经指派专家做过详细的计划,并决定整理的办法。但以荣宗敬氏的反对及所谓元老的说话,竟致政府计划成为画饼”。痛斥上海的金融界,“因对于实业界的投资所获得利益,不能如公债、标金、地产等投机事业的优厚,或因实业界的放款,常有不能收回的危险”,“对于实业界的艰窘反不肯帮助”。挽救今后纱业危机的办法则是“实行棉纱统制”。“产业统制,为今日各工业国家整齐实业步骤,以御外来经济侵略或谋对外经济侵略的最新政策。”<sup>③</sup>在民族主义浪潮下,国民政府最终促成拍

卖案的撤销,申新七厂得以保全。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所实施的统制经济却正是采用了实业部的主张。

这些举措,进一步提升了谷正纲在汪派中的地位。1935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即国际和平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市商会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谷正纲作为汪精卫代表与当时的行政院长于右任、宣传部长邵力子等人先后致辞。<sup>④</sup>11月1日,汪精卫遇刺后,谷正纲同几位汪派元老一同成为蒋介石急于表清白的对象。3日,蒋介石“请顾(孟余)、陈(公博)、谷(正纲)、曾(仲鸣)来谈”,“本日对辑凶事有所指示,对汪之左右说明此案,对内无可怀疑之点”。蒋介石为尽快破案,最大程度消解汪系猜疑,决定“组织研究汪案委员会,以唐、谷、陈、戴、徐、褚为委员”。<sup>⑤</sup>除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与中统头目徐恩曾外,皆为汪系骨干,谷正纲在汪派中的地位已十分崇高且稳固。蒋介石为了洗刷自己刺杀汪精卫的嫌疑,加大对汪派人士的拉拢,提拔谷正纲担任组织部副部长,而谷正纲为表与汪为同一立场,立即提出辞职。

遇刺后的汪精卫对国内政坛心灰意冷,以“疗伤”之名再次出国。“西安事变”的爆发,汪认为夺权的机会又来到,迅速从国外回国,刚到上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汪重夺权力的愿望再次落空。

① 1935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近代著名实业家荣氏兄弟的申新七厂因债务问题被汇丰银行拍卖抵债,日商趁机低价购买。荣氏兄弟利用舆论,请求政府、银行援助。华资银行业在当时政治、经济局势甚为困难的情况下,出于自身利益袖手旁观。南京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虽加以过问,但因内部迟迟不能达成一致,一度将申新七厂推向危险边缘。在民族主义浪潮下,国民政府最终促成拍卖案的撤销,申新七厂得以保全。

② 转引自徐峰华《企业、政府、银行之间的利益纠葛——以1935年荣氏申新七厂被拍卖事件为中心》,《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56页。

③ 谷正纲《从申新七厂事件说到中国的纱业》,《中国实业杂志》1935年第4期,第573、582、583页。

④ 《国际反侵略运动会中国分会成立大会宣布日为人类公敌 推宋庆龄等为赴英代表团》,《申报》,1938年1月24日,第2版。

⑤ 王正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4册(台北)“国史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幻想的破灭,日本开始武力攻击和政治诱降并用,试图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以达到其诱降目的,双方终因各自诉求相差过大而使得此次“调停”宣告失败,中日双方召回大使,断绝外交关系。1937年8月,“汪精卫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撤销,随即设立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任主席,汪精卫副之”。实际上,“汪精卫已在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化状态”。<sup>①</sup>1938年3月11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商讨临时全代会大会提案时,汪即“对党内设领袖制颇不赞同”。<sup>②</sup>然而,蒋却认为“总裁之设,乃团结御侮之最后一着,此着足以增强抗战实力,且无异对敌分化政策一大打击也。”<sup>③</sup>4月初,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总裁,“总裁代行党章所规定的总理之职权”。<sup>④</sup>蒋介石取得了法理独裁的权力,蒋汪之间的权力角逐似乎已经产生了最终的结果。汪精卫不甘就此退出权力中心,认为中日之间并非全无和平之可能,在日本的诱导下,汪精卫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反战心理,不同意蒋介石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所提出的“守土抗战”主张,在不同场合之下进行中日和谈的宣讲,寻求舆论支持,谷正纲亦予以声援。

为筹集抗战经费,蒋介石的亲信成立了“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向各界进行筹款,会长是宋子文,副会长是陈立夫,主要常务委员是孙科、宋庆龄、杜月笙等人。<sup>⑤</sup>对此,谷正纲的做法颇耐人寻味。1937年9月11日,汪派成员、谷正纲的同事兼好友陈克文,在日记中记到“所谓汪派下【】(原文如此)大将谷正纲先生,今晚广播为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对银行家、地主、官吏、党员说话,吐词极不得体,且有暴露自己弱点、挑拨内部对立情感的可能,听后极感不快。”<sup>⑥</sup>年底,汪精卫另寻他道,寄希望通过国际联盟调停来促使中日之间停战,为此他先后发文《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和《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再引申几句话》,表示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唯有继续“循国际和平之路线前进”,但其“和平”主张引发国人质疑。谷正纲又开始为汪精卫进行辩护,不仅在国民党内部作为

汪精卫的代表出席会议,代为阐释,并公开发文《循国际和平路线之前进》支持汪精卫,“近来看一种刊物标题为‘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质疑’,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对这一句话表示怀疑,我觉得有说明必要”,“我详细考虑的结果,知道所谓‘质疑’,由于误解和平为迁就,为妥协,殊不知‘和平’二字,乃反对侵略,无论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皆以此一贯制精神。如果质疑者能得汪先生原文细读一遍,必能自觉其为误解。”<sup>⑦</sup>

为瓦解汪派舆论阵营,1938年1月,蒋介石将谷正纲从汪身边调离,任命其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推动战地党务。谷正纲在协助战区最高长官顾祝同策动第三战区军总政治工作的同时,还负责社会工作,尤其是战时社会救济与福利补助事宜。

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武昌举行,制定抗战建国纲领,谷正纲又被推举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4月15日,谷正纲与汪派其他人士马超俊、许世英等人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及儿童教养院等机构,与宋美龄于一个月前创办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同时筹备,分庭抗礼,继续为汪精卫进行舆论造势,筹集经费,引发宋美龄不快。“同是保育儿童工作,现在竟有两个组织出现,互相竞争,一个是蒋夫人主持的,一个是以党部为中心的,大家都在竞争捐款,拉会员。仲鸣说蒋夫人对此事很生气,他们的组织筹备在先,后来的不应有麝夺的态度。谷正纲却洋洋得意的夸说,他们的组织参加的都是社会重

① 崔之清《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中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65页。

② 叶健青《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台北“国史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258页)。

③ 叶健青《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第325页。

④ 《临时全代会推选蒋任国民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 汪兆铭副之 决召集国民参政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申报》,1938年4月3日,第11版。

⑤ 《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公告第一号》,《申报》,1937年8月24日,第2版。

⑥ 陈克文《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第110页。

⑦ 谷正纲《循国际和平路线之前进》,《民意周刊》1938年,第4期。

要分子,筹款有极大把握,舆论界又如何和他们要好。”<sup>①</sup>

10月,日军相继攻占了广州、武汉,兵力上开始捉襟见肘,没有能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中日双方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试图“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sup>②</sup>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经昆明到河内,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主张中止抗战,对日和谈,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谷正鼎奉蒋介石命,赴河内赠送汪精卫旅欧机票,未被接受。消息传到浙江金华的浙江省党部,谷正纲竟不自禁的大哭“我为党国失去一位人才痛惜!也为汪精卫走错这一步痛惜!”随即发电上报蒋介石,称“往以忠党爱国以事汪,今以忠党爱国以事公”。<sup>③</sup>

### 三、弃汪忠蒋 高官稳固

成立南京伪政权是汪精卫在权力争夺过程的最后一搏,汪蒋权力之争达到顶点。谷正纲宣布脱离汪精卫,效忠蒋介石。蒋、汪二人完全不同的个性使得谷正纲迅速调整自身处事方式,“今以忠党爱国以事公”深得蒋介石之心的表忠<sup>④</sup>以及家人和故友的相助,公众、私下与之前“改组派”成员刻意保持距离,团结身边同事,使得陈克文发出了“党老爷做了官,也慢慢学会官场应酬了”<sup>⑤</sup>的感慨。

1939年12月,谷正纲接替陈立夫出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此时社会部只是中央的一个边缘部门,而非权力部门,“社会部掌理各种民众团体中党员工作之指导,协助民众团体之组织,并策进其事业”。<sup>⑥</sup>就当时的形势来看,一方面,国民政府办公机关处于不断迁移之中,部务难以开展。另一方面,社会部所负责的工作是新兴事务,如何开展可谓是毫无头绪、困难重重,三年后的社会部第一次全国社会行政会议上,谷正纲做工作成绩检讨时指出,依然存在“缺乏成规、机构不健全、人才缺乏、经费太少、对社会行政缺少认识”五大困难。<sup>⑦</sup>对陈立夫而言,抽身这个吃力难为的部门,专任教育部部长,是蒋介石对他的保

护。这一任命还有另一层深意,虽然当时汪精卫叛国,但是汪派依然有众多干将在国民政府之内任职,汪对他们依然有一定的号召力,陈公博等国民党元老追随汪出任伪政府职务颇使蒋难堪。汪精卫既以继承国民政府“法统”作号召,在来上海后,即加紧准备举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人选极为困难。汪密遣新自欧洲回到香港的周化人(旧改组派)潜赴重庆,去拉改组派老人来上海参加和运,仅拉了刘仰山、金家凤、胡泽吾等数人前来。再遣周化人北上拉人,应者更少,乃不得不让CC系的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从江浙地区就地取材,充实数字。<sup>⑧</sup>作为汪派核心骨干,谷正纲被蒋介石拉出来,委以位高权微的社会部长一职,既给汪派人士做出了样子,遏制汪派旧分子投奔汪精卫的势头,又稳定了人心,实质也是一种舆论争夺。1940年10月1日,社会部改隶行政院,谷正纲继续担任部长。

在对待汪精卫的态度上,谷正纲实现了彻底的转变。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不久,4月8日国民政府参政会议结束后,陈克文与谷正纲对汪精卫成立的南京傀儡组织又作一番讨论,谷正纲说当汪出走河内的时候,“便料到会有今日这一个局面了”,“他的根据是过去扩大会议和非常会议的汪的做法。那时候汪以党纪为口号,而自己却不惜依附势力做违反党纪的事。这时候汪以救国和平为口号,亦必不惜依附敌人做出祸党

① 陈克文《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第199页。

②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39页。

③ 黄少谷《回忆老友谷正纲先生的生平》,《谷正纲先生年谱》(台北)谷正纲先生年谱编辑委员会1994年版,第263—264页。

④ 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1935年9月)》,张其驹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46页。

⑤ 陈克文《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第682页。

⑥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年版,第276页。

⑦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7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70—171页。

⑧ 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7页。

乱国的把戏来。他对汪精卫的观察推测现在已经事实的证明。”<sup>①</sup>谷正纲还特别注意与之前的汪派成员保持距离,汪精卫死后,以前改组派成员在黄少谷家中聚餐,到廿余人。此乃抗战后之第一次集会,参加者有邓飞黄、黄少谷、刘瑶章、钱公莱等。以前所谓改组派之重要分子,当时在渝者,如谷正纲、王懋功等均未到会,或有意规避亦未可知。<sup>②</sup>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中共在北方战场上取得全面胜利,迫于形势,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再次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任总统。在宣布下野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毕,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洪兰友、张道藩等竟失声痛哭,全场空气万分哀痛”。社会部长谷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sup>③</sup>谷正纲坚决抵制代总统李宗仁与中共进行的和平谈判,表示“全面而光荣的和平可以接受,局部而投降的和平不能接受”,并一再标榜自己“宁为史可法,不做洪承畴”。<sup>④</sup>3月1日,不顾孙科内阁挽留,谷主动离职,前往奉化拜谒蒋介石,以示追随之意。21日,社会部在谷离职后不久,即被行政院宣布裁撤。此番效忠亦为谷正纲日后在台湾的职位稳固打下了基础。

#### 结语

谷正纲投效蒋介石,在社会部部长任上创造的民国职官奇迹,其中原因复杂,本文不做详论。就其前期仕途来看,贯穿汪蒋权力之争整个过程。从刚加入汪派的争“党治”到后来争“舆论”,谷正纲职位不断提升,撇开家族庇护及不断成熟的个人政治智慧不谈,这与当时特殊时代背景下汪蒋二人权力之争中的相互妥协密切相关,但最主要的应是汪精卫自身性格缺陷所导致的对谷正纲的倚重。汪精卫自命清高、沽名钓誉。汪伪国民政府时期追随汪精卫的雷鸣在为其所作传记中,更倾向于汪精卫是一个“文人”的看法,而这种文人认同,又使他在政治斗争中过于强调“姿态”,重视营造“人格魅力”,行动中常带有某种“表演性”,耻于承认自己的权力欲望,致力于

以情谊和人格感召来维系部属的信赖和服从。<sup>⑤</sup>在二十世纪早期,派系林立、纷繁复杂的国内政坛斗争中,更需要蒋介石这样有着坚毅性格、铁腕手段的人。谷正纲的“党痞子”行径对汪的缺陷恰好形成了一种补充,可以为汪讲出其不方便说的言论,如“蒋介石之罪大恶极”“蒋中正篡窃本党”等。因此,谷正纲在汪派内部,属于后进,也不讨人喜欢,“惟汪先生似甚倚之,亦难明其所以矣”,后来慢慢成为汪精卫的亲信。蒋介石派谷正鼎而非谷正纲赴河内劝汪精卫出国,勿做汉奸,恐怕也有避免谷正纲为汪“雪中送炭”的现实衡量。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谷正纲与民国社会建设研究(1939—1949)”(2016SSD19)阶段性成果。

[陶仁义: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邮编:365001

杨荣庆: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邮编:550000]

[责任编辑:蒋梅]

① 陈克文《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第577页。

② 陈克文《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948页。

③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④ 朱明国编著《大上海1949走出屈辱》,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⑤ 李志毓《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22页。